

优容·征服·怀柔:唐初二帝经营东突厥战略述论

朱德军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隋末唐初,东突厥再次崛起于蒙古草原,在此鼎革之际,俨然以“共主”的身份操纵北方政局。为了获得它的声援和支持,李渊父子主动向其输诚,并通过倾力交好,尊崇优容的方式,在满足其物资贪欲的同时,促使它成为大唐统一的推手。随着翦灭群雄,帝国开始追求“敌国”地位,从妥协、退让发展为对抗与征服。随后利用东突厥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一战而定北疆。此后大唐以开放的心态、恢弘的气度对待突厥的降人,并通过怀柔与安抚,推行“胡越一家”的国策,实现大唐皇帝与西北游牧民族君长“天可汗”合一。

关键词:优容;征服;怀柔;唐初;东突厥;草原丝路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8)04-0196-08

隋代的东突厥汗国,一度因汗位之争,导致汗国的分裂与衰弱,而隋廷积极推行“以离强、分治为内容,以合弱、怀柔为手段”的突厥战略^[1],推动这个草原汗国更加式微,成为隋朝的藩属。然而这个王朝的盛极而衰,随着隋末的纷乱,东突厥再度勃兴于漠北并称霸草原,“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2]5153}。

在隋朝废墟上涌现的乱世群雄,最初以反隋为目标,随着隋朝的覆灭,扩充地盘,逐鹿中原便成为他们的新诉求。为了战胜对手,竞相谄媚于突厥,薛举、刘武周之流“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3]11733}。突厥则利用其寻求支持的心理,以册封的形式取得“宗主”的地位,并借机向其予取予求;同时为了长期控制中原,竭力扶植弱势的一方,以维系北方割据的长期化,这就为它介入中原纷争,干预内地的政局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李渊“举义”之初,鉴于实力尚虚,为了乱世图存,急欲交好突厥,并“引以为援”^{[2]5153}。为此主动向它称臣纳贡,以屈辱的条件为代价,商议“共定京师”^{[4]3735}之谋。此时的李渊集

团,相较于这些乱世群雄,确实更有战略眼光,也更具远见卓识。李渊父子立志于一统山河,虽有向突厥输诚之举,以防止被其他势力所利用,但这不过是他们的权宜之谋。终唐初二帝之世,李唐对突厥的经营,随着实力的增长,其战略明显经历由倾力交好,尊崇优容到纵横捭阖,武力征服,最终通过怀柔安抚,以实现“胡越一家”的发展历程。

一、倾力交好,尊崇优容

高祖李渊,早在龙潜之时,就有经略“四方之志”^{[2]2290}。在隋末“群贼蜂起”之际^{[2]2},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群雄之一”,起初它并不具备超群的实力,在强邻“几皆称臣于突厥”^[5]之际,也急欲交好于突厥,为即将开始的“举义”提供奥援,开启双方正式交往的历程。

(一)太原“举义”与交好突厥

隋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本系炀帝为牵制李渊而设,大业十三年(617),李渊潜使刘文静诬其“与北蕃私通”,然“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李渊却“神色自若,欢甚于常”。自言他“适欲起兵,威、雅沮众”,正“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岂料“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为孤罚罪,非天意也”?于是便

作者简介:朱德军,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后出站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军事史、唐宋史、丝绸之路。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变迁与西北防御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3XZS012)。

巧借“天意”，“伪作符敕”，扫地为兵，并修书东突厥始必可汗。这在他的幕僚温大雅所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甚详，其文略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自去自来，岂非天所为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须同我。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6]

在这份信函中，李渊用辞极为“谦卑”，告知突厥，他的起兵实乃“天意”所趋，为迎接“主上”回朝，恢复“开皇之时”与突厥的“和亲”关系。突厥如能出兵相助，承诺“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即便“不劳兵马”，只要双方“和通”，亦可“坐受宝玩”。李渊集团有人认为突厥人粗鄙无文，“惟重货财”，主张以“厚遗”，而无需卑辞取媚，遭到李渊的申斥。他直言为“伸于万人之上”，虽“屈于一人之下”也在所不惜。何况“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大唐创业起居注》还记载随后的交往：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异常之事。……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6]

始毕可汗获函，大喜过望，表示李渊若能“自作天子”，突厥为“觅大勋赏”而同意出兵。

需要指出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曾担任李渊的记室，亲历并熟知李唐“举义”的内幕与唐突交往的始末。书中虽不乏讳饰的“春秋笔法”，但仍曲折地透露出双方交往的秘辛。李渊担心“举义”之后的“突厥南侵”，未料“更相要逼”，让他取“隋主”而代之。鉴于有求于突厥，岂能“乍可绝好蕃夷”？对僚属的“苦劝”，以“臣节安在”相斥。当裴寂以“士众已集”，势成骑虎之后，就借曾经的伊、霍“故事”，表示接受。于是突厥令康鞘利率兵赴约，“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永人西郊，无容预执，宜兼以绛，杂半续之’。”^{①[6]7-11}

温氏如此记述大唐的“举义”，似乎仍觉得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便迫不及待地给李唐称臣突厥一事洗白，于是又借助于开皇初的“太原童谣”与《桃李子歌》鼓吹大唐的“受命之讖”。陈寅恪先生指出：温大雅在“述（及）当时（唐）与突厥之关系，最为微妙，深堪玩味，如改帜一事，辞费文繁，或者以为史家铺陈开国祥瑞之惯例，则不达温氏曲为唐讳之苦心”^{[7]112}。然李渊“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讖’”，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他所谓的“臣节”不过尔尔。接着温氏还记载李渊接待突厥使臣一事曰：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餽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从此以后，帝每见，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礼^{[6]11}。

陈寅恪先生也指出“温氏用委婉之笔叙述唐高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服之事，‘始毕所送书信’即突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帝伪貌恭’即称臣拜服之仪”^{[7]114}。宋代史家范祖禹道出此举的真谛，“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8]1}，可见李渊称臣突厥之确凿。我们从《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相关记载中，不难看出李渊“举义”实属蓄谋已久，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可谓费尽心机，除了向它称臣、纳贡，还允诺包括“和亲”、“改帜”、“受封”等诸多屈辱的条件，向其借兵，意在“取其声势”，亦在“以怀远人”^{[6]13-14}。

（二）大唐立国与优容突厥

自李渊太原起兵，一直对突厥格外用心。占据长安后，群雄虽也对突厥俯首称臣并“供奉”不断，但远不能与李唐的努力相提并论，史载其“前后餽遗，不可胜纪”^{[9]5792}。在外交上用力颇深，不论汗国的贵族，还是衔命赴唐的使臣，一概倍加礼遇。如骨咄禄来朝，高祖在太极殿隆重接待，“奏九部乐，引升御坐”^{[4]6028}以示宠遇。甚至还特派襄武公琛、太常卿郑元琬“以女妓遗始毕可汗”。突厥遣使来唐，即便“恃功骄倨”，唐廷也每每“优容之”^{[9]5814, 5792}。唐朝对突厥执藩臣之礼甚恭，这样既赢得汗庭内外的普遍好感，也获得始毕可汗本人的信赖与欢心。

唐朝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在满足突厥贪欲的同时，在外交上的努力也远超当时的群雄，尤其在群雄角逐的关键时刻。当李渊率军入关之后，雄霸陇右的薛举也欲染指关中。浅水原一战，唐军大败，“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被迫放弃战略要地高

墟城^{[9]5800-5811}。此外,薛举“连结梁师都”,还“厚赂突厥”,准备合兵进逼长安。^{[2]2247}李渊急令宇文歆“资金帛以赂颉利”^{[2]5155}。在重金与割地的双重诱惑下,突厥毁约助唐合击薛举,从而“在根本扭转了西线的不利形势”^{[10]206},使得胜利在望的薛举功败垂成,成为大唐转危为安,翦灭群雄的决定性一役。

唐朝消灭薛举集团后,加快了统一的步伐,积极向西部推进,迅速占据陇右。割据凉州的李轨极为惶恐,于是在“连好吐谷浑”的同时,还“结援于突厥”。大唐欲兴兵讨伐,然因受制于人,故“尚以为难”。凉州粟特人安兴贵招降未果,与兄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执之以闻”。^{[2]2251-2252}由此关中、陇右、河西三大区域被纳入大唐的版图,随后又在中原、河北等方向上攻城掠地,初显大国的气象。

东突厥始毕可汗,终身致力于反隋,在李渊起兵之初,即举兵相助。在唐军决战于薛举的关键时刻,在宝货、女妓的诱惑下,轻率地背弃了盟约,并强力助唐,遂使大唐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随着王朝的统一不断取得进展,其勃兴之势更加强劲,这打破了自隋末以来“群雄”在北方形成的均势,威胁突厥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国策,导致始毕的继任者处罗可汗确立了以“复兴隋朝帝室、阻挠中原统一的新方针”^{[10]210}。他“不再均衡地分别支持各支反隋势力,而是将它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唐复隋之业”^{[11]3},故必然要求其卵翼下的“群雄”予以支持。

作为隋末唐初的群雄之一,刘武周很早就与东突厥建立了联系,但随着汗国中原战略的改变而最终反目。武德二年(619),突厥发兵助其南寇,唐大将李仲文全军覆没,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大败,右骁卫将军刘弘基被俘,齐王李元吉败逃关中,河东大部州县陷落,“关中震动”^{[4]3712-3713}。在这场生死大战中,刘武周的“不合作”态度激怒了处罗可汗,于是怒而“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9]5884},导致刘武周兵败而亡,一代枭雄折戟沉沙。

由此不难发现,东突厥汗国对维持北方的均势,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多属低层次的感性认识,既缺少深谋远虑的筹谋,加上其君臣目光短浅,“惟贿是求”^{[9]6020},严重低估了李唐的政治抱负,也低估它运筹帷幄的智慧,对他们的能力缺乏充分的估计,很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在丰厚财物的诱惑下,在表象尊崇的言辞面前迷失了既定的目标,如前述李唐大战薛举之际的毁约,李唐大战刘武周时的反戈无不如此。

李渊父子在羽翼未丰之前,竭力与东突厥交好,

无论是短暂的“蜜月”,还是临时的妥协,无不倾力而为,以求得它对兼并战争的容忍。争取一切可能,力争其成为唐朝统一大业的推手,至少在统一完成前,不致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除了经常性“致币”外,可汗亡故,唐廷遣使凭吊,并致赙礼,以维系外交上的“友好”关系。如武德元年底,高祖敕“驃骑将军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当可汗死讯传来,唐暂停“致币”,突厥闻之大怒,一度欲南下“问罪”。唐廷慌忙遣使“馈劳”,继续以“专致赙赐”^{[4]3745}的名义履行义务,最后才快快“引还”^{[2]2301}。当突厥的告哀使至京,高祖“举哀于长乐门,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往吊”,“赙帛三万段”^{[9]5858},以此表达“敬意”。次年,处罗可汗病死,“高祖为之罢朝一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2]5155}。颉利即位后,虽对唐屡有“凭陵”,但鉴于中原初定,仍“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11]5408}。这里的“赐与”,实为唐代史臣的讳饰之辞。这并不能掩盖它在实力不济,以金钱、货贿为手段,换取东突厥控制下“和平”的客观事实。唐朝通过“屈尊纡贵”的委曲求全,纵横捭阖的游说以及大量的“供奉”,逐步实现扫灭群雄,统一中原的战略目标,为解除东突厥威胁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纵横捭阖,武力征服

大唐起兵之初,群雄并起,李渊集团势单力薄,为了乱世图存,依附强者不失为明智之举。东突厥汗国作为当时的东亚强权,获得它的支持不仅是李唐立足关中的前提,也是随后翦灭群雄的关键。鉴于双方实力悬殊,在较长时间内,唐朝并不具备挑战突厥的能力,默认宗藩关系的存在,既是实力的必然,也是客观形势的需要。这给唐廷带来无尽的屈辱,但唐朝丝毫不敢怠慢,否则会引起激烈的反弹,如前述高静“奉币”突厥事件。如果说大唐在实力不济之时的忍辱负重是为赢得支持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随着实力的增长,就越来越难以忍受突厥的骄横。为了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的过早摊牌,利用突厥贪婪的心理,以巨大的物质代价换取它对统一战争的支持,如前述唐平薛举时的反戈一击,唐灭刘武周时的背盟毁约概莫能外。

尽管如此,唐朝与东突厥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武德二年以后,刘武周勾结突厥发起河东之战,李渊遣使汗庭,试图说服可汗未果。处罗正欲举兵,然暴疾而亡,突厥怀疑唐廷“令人毒之”^{[3]7936},于是将使者幽禁。随后高祖“又遣汉阳公瑰厚赂颉利

可汗以金帛,颉利欲令瑰拜,瑰不从,亦留之。又留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上怒,亦留其使者”^{[9]5812}。直到李大恩挫败突厥,方才放回唐使,高祖亦令其使者“还蕃”^{[2]5155},从中不难看出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

随着刘武周兵败身死以及窦建德、王世充的相继覆灭,唐朝与突厥“友好”关系也急转直下。当时颉利屡有“凭陵中国之志”^{[9]5907},由此前支持群雄反唐,发展为直接发兵寇边。据《资治通鉴》记载:从武德四年正月到武德九年十月,在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突厥西自河陇的甘、凉,中经关中的原、灵,继之以河东的朔、代,东达河北的幽、易等州,沿边之地遍遭荼毒,许多州郡反复遭到洗劫。武德七年后,突厥频繁深入内地,甚至京畿也遭其蹂躏^{[9]5904-6025}。鉴于唐朝的统一尚未完成,忍辱负重势难避免,但反对一味地“不战而和”,认为若“击之克捷”,而后和解,则“威恩兼举”^{[3]11634};同时还派郑元琬“规劝”颉利可汗与唐朝修好,并指出:

突厥得唐地无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两不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财资,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岂若仆旗接好,则金玉、重币一归可汗。且唐有天下,约可汗为兄弟,使驰衔捶于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胎怨,自取劳苦?^{[4]3938}

唐使以利益相诱,让颉利放弃“一无所获”的盗边行为,代之以“约为兄弟”与“坐受其利”的和平交往,他欣然接受。因其欲壑难平,加上“以寇抄为生”^{[2]5159}游牧生活方式的使然,虽“赐与不可胜计”,仍“求请无厌”^{[2]5155}。这表明唐朝企图通过妥协、退让的方式,以“供奉”换取强权控制下的和平,并不足以解除突厥的威胁,故唐朝对其政策的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一)大唐北疆政策的转变:从退让到对抗

唐朝与东突厥的政治交往,正当隋末“皇图板荡”之际,当时高祖“未伸龙跃”,被迫“屈已求可汗之援”^{[2]18}。李唐最初的委曲求全,实属无奈之举。随着实力的增长,尤其统一战争的顺利推进,对东突厥的政策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调整:一方面,由被动防御,开始转变为积极对抗,强势的军事还击成为应对之策;另一方面,废除宗藩关系,积极追求平等的“敌国”地位。然而这些政策的调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经历一个近乎十年的渐进发展的历程。

1. 由被动防御到积极对抗

隋末以降,北方的乱世枭雄一律奉东突厥为

“共主”,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在其唆使下与李唐争雄天下,但随着唐朝统一战争的节节推进,原来它们赖以维系的脆弱平衡被逐渐打破,不少盛极一时的割据势力土崩瓦解。东突厥便从幕后走向前台,却始终未能给唐朝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大唐也由起初打击其卵翼下的群雄,开始将它纳入直接打击的范围。如武德五年,代州总管李大恩奏称“马邑可取”,李渊遂令其率兵攻取,虽因协调不力而溃败,却由此揭开了主动进攻的序幕。五年八月,中书令封德彝指出,突厥向来轻视大唐,“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9]5950-5954}!李渊深然其议。

武德七年以后,东突厥将侵唐的重心转移至关中,确立了“秦陇丝路北段、长安丝路通回纥道灵州段为主攻方向”^{[13]282},帝都长安承受巨大的防御压力。形势危急,朝中有人提请迁都。李世民力排众议,认为“戎狄为患”,自古皆然,若“以胡寇扰边”,而“遽迁都以避之”,必然贻笑天下。最终采纳李世民之议,决定固守京畿。是年八月,突厥“举国入寇”,因连月阴雨,致“弓不可用”,唐朝巧施离间,并“潜师夜出”,突厥一度陷入窘境。九月,“破之”于绥州。九年四月,再败之于“灵州碛石”;七月,又破之于秦州;八月,复“大破”其于泾阳。唐朝在关中的防御作战也失利不少,如八年八月,并州道总管张瑾“全军皆没”^{[8]5989-5993}。随后,颉利、突利连兵入关,一度进至渭水之滨,太宗亲率六骑“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随着“众军继至”,颉利见唐“军容既盛”,“由是大惧”^{[2]30}。随后太宗复与突利耳语,突利不告而退,颉利疑其有变,匆忙在渭水盟誓后退兵。不过此时的唐朝,依然对突厥采取绥抚之策,以便集中精力消灭割据残余,以免陷入多面作战的困境。

2. 追求平等的“敌国”地位

李渊起兵之初,为了获取突厥的支持而称臣纳贡,唐朝的“无奈”之举实属权谋。随着群雄的渐次消失,唐朝在外交层面进行调整,积极追求平等的“敌国”地位。不过唐朝“敌国”地位的取得,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武德元年(618),始毕可汗亡故,“高祖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还派专使致祭,并“赠物三万段”。此“赠物”实为藩属对宗主的贡物。三年,处罗可汗死,唐朝降低礼仪规格,仅“为之罢朝一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四年,颉利可汗即位,因对唐朝采取敌视政策,汉阳公李瑰、太常卿郑元琬、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等衔命

出使,“颉利并拘之”。唐朝也针锋相对地“留其使前后数辈”,直到李大恩挫败突厥的攻势,它才放回唐使,并“更请和好”;唐亦放其使者“还蕃”。^{[2]5155}唐朝以对等举措回击突厥的挑衅,实质就是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的集中表现。

武德五年,汉阳郡王李瑰再次出使东突厥,“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一改此前唐使每至,必以藩臣自居的状况。这时颉利虽“箕踞”以见,但在厚利面前,“改容加敬”。对此,颉利深以为憾,遂决意“必令下拜”,李瑰仍“长揖不屈节”^{[3]7912}。如果说上述行为“非正式”地体现了唐朝追求平等“敌国”地位的不懈努力,那么官方外交文书的称谓则更为正式和直接。武德八年六月,颉利寇灵州,唐廷命大将张瑾率兵防御,高祖“与突厥书用敌国礼”。七月,高祖言于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9]5996}此前,唐朝与东突厥官方往来的文书,最初使用谦卑的敬词“启”,随后改为平等的“书”,最终为君王号令臣下的“诏敕”。这虽是大唐向外一个高调的宣示,但也表明它并不单纯满足于与东突厥的平起平坐,而且希望超越“敌国”地位,以实现“君临天下”的目标。

(二)大唐北疆政策的转变:从对抗到征服

就中古而言,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自身的实力,其中尤以军力的强弱最为关键。唐初为了在群雄中立足,特别期待强权的支持,为此也付出对突厥称藩纳贡的代价。然而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李渊集团,不同于一般的乱世枭雄,仅满足于托庇于外族羽翼下的割据一方,而是意图重新一统天下,恢复秦汉盛世。武德、贞观之际,随着北方统一的完成,大唐国力蒸蒸日上,军事实力也有了很大的跃升。与此同时,突厥内部的矛盾加剧,汗国呈现衰败之象;加上唐朝大量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积极寻找机会给它致命的一击,这一切为唐消除东突厥威胁,进而完成对其征服的历史使命准备了条件。

1. 利用东突厥汗室的矛盾

作为游牧政权,东突厥汗位继承制度非常混乱,造成汗室矛盾重重,在削减内部凝聚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外的离心倾向,这就为唐朝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提供施展的空间。

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两可汗“率万余骑”进至渭水之滨,太宗率数骑会于便桥,责颉利“背约”。还令人扬言于突利:“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颉利闻言,“阴猜突

利”。太宗趁机离间,迫使突厥取消会攻长安的计划,其“叔侄内离”^{[2]5156}暴露无遗,成为“东突厥汗国政治危机的表面化与深刻化”的重要标志。渭水之役后,颉利为了控制突利,向其部征兵,突利“拒之不与”,导致叔侄兵戎相见。贞观三年(629),突利正式脱离东突厥汗国,率部降唐。

当然,东突厥汗室的矛盾,也不仅限于颉利与突利之间,其实还包括颉利之兄处罗可汗的长子郁射设及族人毕特勤的矛盾。武德元年,郁射设(即阿史那摸末)率部落万余帐入居河套,控制了丝路关中通往回纥道的中线北段。由于其“丑弱”,被废而不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此次汗位的“嬗递继承”,造成郁射设与颉利的“矛盾与疏离”^[14]。颉利即位后,突厥南下关中,却选择丝路灵州道与陇州—长安道,而没有采用更为便捷的通道,使得“河套南下的道路则几乎完全被废置不用”^{[10]203-204},表明郁射设与颉利可汗的猜忌之深。随后,唐将刘兰复行反间,“颉利果疑”,致使郁射设率众“来降”。^{[4]3836}而毕特勤(即阿史那思摩)的“曾祖伊力可汗,祖达拔可汗”^{[15]112-113},伊力,即土门可汗,达拔可汗即达头可汗,可知毕特勤系颉利之从叔,因相貌似胡,“不类突厥”,终始必、处罗、颉利之世,一直“不得典兵”为设^{[3]11698},故深以为恨。随着突厥内乱的加剧,众多的部族首领首鼠两端,如渭水相持,突厥“达官皆来谒”^{[9]6020},清楚地表明其离心倾向的严重程度。

2. 强化与东突厥属部的关系

在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之时,它与属部关系也恶化了。对此唐朝竭力加以利用,力图进一步削弱其力量。东突厥统治的核心是阿史那汗室为首的贵族集团,对其治下漠北九姓大肆进行压迫,迫使它们放弃原有的族名,在经济上“厚税敛”,在军事上“强征兵”,这虽“确立其宗主国的绝对权威”^[16],却激化了它与属部的矛盾,造成“下不堪命,内外多叛”^{[12]5411}。汗国东部的契丹、奚、靺鞨等部族也掀起反抗斗争。贞观二年(628),契丹酋长降唐,漠北薛延陀、回纥、仆骨等铁勒诸部也叛乱蜂起。颉利令兄子郁谷设率兵平叛,回纥“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9]6045}。其后,东突厥国人离散,民心思乱。

在东突厥渐趋衰亡之时,薛延陀却日渐壮大,铁勒诸部多“叛归之”。贞观二年,逐渐形成以它为核心的反东突厥联盟,酋长夷男“反攻颉利,大破之”,颉利的属部也多叛归。太宗当时“方图颉利”,派游

击将军乔师望册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承认他对漠北各部的统治。夷男遣使贡献方物,随后建立起“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的强大汗国,回纥、同罗、仆骨等部落“皆属焉”^{[2]5344}。东突厥的版图则急剧收缩,力量严重削弱,处于大唐与薛延陀汗国的南北夹击之下。

同时的西突厥汗国也再次崛起,可汗统叶护“勇而有谋”,他“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一度达到势力的极盛^{[2]5181},东突厥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西突厥向唐廷恳请“和亲”,力主“远交而近攻”的中书令封德彝,认为唐应“权许其婚,以威北狄”^{[12]5455}。高祖表示同意,遂遣使前往。因“东突厥岁犯边,西蕃梗涩”,双方虽通婚未果^{[4]6057},但依然维持密切的外交关系。武德八年,统叶护再次向唐遣使“请婚”,并借此“缔结了共图东突厥的和亲盟约,为大唐反攻作好了政治准备”^{[10]247}。

3. 唐朝的北伐准备与军事征服

唐朝基本完成统一后,时刻关注东突厥局势的发展,并针对它在外交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贞观二年,东突厥危机四伏,内外冲突加剧,出于平乱的需要而四处出兵,军力进一步削弱。境内又灾害频发,“六畜多死,国中大馁”^{[2]5159},统治者又不修政理,加上叔侄“屡相怀贰”^{[3]1501}。在得知薛延陀酋长受封可汗后,颉利极度惶恐,主动向唐廷“遣使称臣”。此时代州都督张公谨上疏,提出突厥有“六可取之状”,指出唐朝出兵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不失时机地进行北伐。为了摸清对方的虚实,郑元璠衔命出使,他发现它“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饭化而为血”。鉴于这些“不祥之兆”,断言不出三年,东突厥“必当覆灭”^{[2]2380}。三年,唐朝积极进行战争部署,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随后,太宗下达总攻命令,唐军兵分六路,由李靖统一节制,分道出击。

同年底,代州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以逼之”^{[3]3816}。四年二月,又“次阴山,击颉利可汗,大破之”^{[3]4236}。颉利轻骑逃脱,退保铁山,在恳请“入朝谢罪”的同时,“请为藩臣”以为缓兵之计^{[3]11739}。太宗于是将计就计,派鸿胪卿唐俭前往“慰谕”,并“驰传至虏庭”,故突厥“兵众弛懈”^{[2]2307}。李靖统兵直趋可汗的大帐,以苏定方为前锋趁雾疾行,颉利“惶窘遁去”,“余党悉降”^{[4]4137}。李勣又在碛口截住其残部的逃窜之路,于是转逃沙钵罗部,准备稍事休整,越祁连山南

转投其母氏吐谷浑。在唐朝的威逼下,酋长苏尼失因令其子忠“诱执颉利可汗而以归国”^{[17]602}。最终“单于稽首”,“名王面缚”,“被发左衽之乡,狼望龙堆之境”,而“无复王庭”^{[18]477}。随着东突厥的消亡,大唐遂拓境至漠北,漠南之地全部被并入帝国的版图。

三、怀柔安抚、胡越一家

武德、贞观之际,东突厥曾盛极一时,一度兵犯渭桥,京师“咸忧于左衽”^{[2]19}。然而在内外矛盾的推动下,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处于天灾人祸交织下的东突厥,在唐军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草原枭雄颉利可汗折戟沙碛,这不仅使得盛极一时的草原汗国覆灭,而且标志着“东亚局势发生根本性的转折”^{[19]212}。一洗前耻的大唐,从此开创了盛世王朝历史的新纪元。

东突厥汗国覆灭后,余众溃散,部族多来归附,成为大唐的子民,突厥则“由域外民族变为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诸民族成员”^{[10]264}。唐朝为了消弭他们的反抗心理,开始了怀柔、安抚,以实现“胡越一家”的历程,对归顺的突厥贵族极为优容,对此史籍与出土的墓志多有记载。

武德七年(624),阿史那思摩“因使人朝,蒙受和顺(郡)王”。他虽“屡为边患”,因“明晓去就”,贞观三年(629)“入朝”。太宗“嘉其遁诚,赐姓李氏,封怀化郡王,右武卫大将军”。十三年,“改授乙弥泥孰可汗,帅部落归于黄河之北……又授瀚海道行军总管……(卒后)诏赠兵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夏绥银三州诸军(事)、夏州刺史……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冢象白道山。葬事所须,并宜官给”^{[15]112-113}。

武德九年(626)八月,颉利可汗侵唐,并遣执失思力入朝“觐风”,被唐廷扣押。戡平突厥后归附,先后拜右领军大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安国公^{[3]10925}。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郁射设率部降唐,唐廷“用奖忠诚,即授上大将军,寻迁左屯卫大将军。肃奉宸居,典司禁旅……夫人李氏,平夷县主”^{[20]47, [21]345}。太宗更敕称其妻“是朕亲旧,情同一家”,他们“初婚之时,在朕家内成礼”^{[22]455}云云。

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等“并帅所部来奔”^{[2]5159}。四年三月,诏授其右卫大将军、顺州都督,“封北平郡王,食邑千户”^{[3]11337}。

四年(630)正月,胡酋康苏密携萧后与杨正道归国,“授尚衣奉御”^{[2]3225},后为云麾将军^{[2]5349}。

四年三月,唐军俘颉利至京,“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廩食之”,授以虢州刺史。因坚辞不就,遂“授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2]5159}。出土的墓志还载唐封其“左威卫大将军,赠归义郡王,食邑三千户”^[23]。

四年五月,颉利的从叔苏尼失“举众归国”,诏拜“左骁卫大将军、宁州都督、怀德元(郡)王”。其子忠执颉利归国,“蒙加宠命,左屯卫将军、检校长州都督……婚定襄县主,袭封薛国公……辽东奉见”,“仍授上柱国”,薛延陀犯塞,“诏率全军,应时摧殄”,迁右武卫大将军,后为左武卫大将军,“寻迁右骁卫大将军”^[24],死后“赠镇军大将军,陪葬昭陵”^{[4]4116}。

六年(632),铁勒酋长契苾何力,亦“奉表内附”,授左领军将军。一度被执薛延陀,他“以身许国”,坚贞不屈,先后拜右骁卫大将军、左骁卫大将军,“累封郕国公,兼检校鸿胪卿”^{[2]3291-3293}。

九年(635),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率众内属”,拜左骑卫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后册封毕国公,兼鸿胪卿,再迁右卫大将军,加镇军大将军,陪葬昭陵^{[2]3289}。

由上述材料可知:至少从武德之末到贞观九年,东突厥及其别部的贵族无论从最初的谈判被扣,还是主动归顺,抑或战败归国与无奈投唐,也不管曾祸乱边庭,唐政府一律予以既往不咎,尤其对阿史那氏最为优待。通常以封官授爵的形式对这些降人进行怀柔,唐廷“多将其酋帅充任武职”^[25]。他们常“典司禁旅”,成为大唐“禁卫军的将官,担任戍卫朝廷的重任”,并“深得皇帝的信赖与重用”^[26],或朝廷“配妻以宗室之女”,或直接“尚主”,甚至还获得“赐姓”、“陪陵”等荣宠,死后还给予“官给葬事”的礼遇。史称“其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3]4846}。表明中央不计前嫌,“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9]6148}。唐廷对上述归顺者大肆封赏,其封赏的标准也远高于汉将。

唐平东突厥之役,理论上应以六路主将功劳为大,其中尤以李靖、李勣、李道宗三者为著。如果从爵位、官职上进行考察,此役后的李靖、李勣仅为光禄大夫,道宗仅郡国公。几年后,李靖、李勣才获爵国公,而道宗则为郡王。李靖由北伐前检校中书令,升尚书右仆射;李勣由并州都督,拜并州大都督府长史,遥领大都督;道宗则由大理卿,拜刑部尚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突厥贵族,颉利可汗、突利可

汗、阿史那思摩、苏尼失均受封郡王,执失思力、阿史那忠、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均获爵国公,且多任大将军之职。至于物质上的给赐就更为丰厚,唐廷动辄赏赐“食邑千户”,或“赐以田宅”,或“厚廩食之”。汉将的受赐之薄可以忽略不计,这或与唐廷借外族将领打压开国武臣不无关系^{[13]290-292},此后“突厥降将日益得到重用”^{[10]380}。

当然,唐朝对待突厥降人的安抚并不限于贵族群体,事实上还包括归顺的部族百姓。如贞观四年,太宗为进一步怀柔归降者,规定“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3]4847}。朝廷“愍其部众冻馁,遣于碛口贮粮,特加赈给”^{[2]2388}。对异族战败的归降者,如此宽容,可谓空前绝后。唐朝抛弃了自古以来“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对任何愿意效忠于大唐,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论其来自何方,一概“爱之如一”^{[9]6247}。颉利的败亡,“部落咸来归化”,唐待之“皆如吾百姓”^{[9]6148}。更让人惊讶的是,对长期以来的“勍敌突厥”,竟允许酋长“带刀宿卫”^{[27]36}。他坚信“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对他们完全予以信任,而“不必猜忌异类”。并公开宣称,如能恩泽普照,华夷和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9]6215-6216}。

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东突厥败亡后,部族大量南迁,数额不下百万,不少人因“久从编附”而改变游牧生活方式,变成“乃同华夏”^{[3]11584}的百姓。由此不难看出贞观君臣以怀柔治万邦,“仁政”理天下,极少具有民族偏见,不仅实现了长期以来“胡越一家”的梦想,而且开创了“自古未之有”^{[2]18}之局面。体现了唐初君臣不念旧恶,包容万方的气度,显示出泱泱大国的气派,因而赢得包括东突厥降人在内的真诚拥戴。贞观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28]1796},以致太宗一再被归顺的蕃将称为“华夷父母”^{[28]526}。此后,唐朝的皇帝既是大唐的天子,也是西北各族至高无上的“天可汗”,初唐的怀柔之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四、小 结

隋末唐初,东突厥再次勃兴于蒙古草原,在此易代之际,俨然以“共主”的身份操纵北方政局。高祖、太宗鉴于东突厥的强盛及自身实力的不足,为了乱世图存,主动向其输诚,通过倾力交好,尊崇优容的方式,在满足突厥物资贪欲的同时,促使它成为大唐统一的推手。随着大唐逐灭群雄,国力获得很大的跃升,尤其统一的基本完成,它日益自信,渴望摆脱屈辱,对突厥的策略开始从妥协、退让发展为对抗

与征服,并利用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一战而定北疆。此后大唐以开放的心态、恢弘的气度对待突厥的降人,通过怀柔与安抚,推行“胡越一家”的国策,实现唐朝的皇帝与西北游牧民族君长的合二为一的“皇帝天可汗”,为后世民族的和谐与融合开创了一段千古佳话。

注释:

①[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七五《讖记·唐受命讖》(中华书局,1960年,第9971页)内含“太原童谣”与《桃李子歌》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桃李子,鸿鹄绕阳山,宛转花林里。莫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洪水绕杨山。江南杨柳树,江北李花荣。杨柳飞绵何处去,李花结果自然成”。《大唐创业起居注》云:“隋主恒服白衣,幸江都,拟于东海以应之。后高祖起事,众请法周武,执白旗,帝兼绛杂半续之焉”;又“李为国姓,桃若言陶唐也。帝起兵,旗幡赤白相映,若花园”。下文的“洪”者,渊也,洪水指李渊;“杨”者,隋之国姓,杨山、杨柳树即指隋朝。温氏以“谣讖”的形式,宣称隋唐鼎革实属天命所归,掩盖其叛隋的“假名窃位”之实。

参考文献:

- [1]朱德军.逐鹿北疆:隋代文场二帝经营突厥战略述论——兼论草原丝路的兴衰[J].宁夏社会科学,2017.01.
- [2][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宋]王钦若,杨亿,等,撰.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陈寅恪.论高祖称臣与突厥事[J].岭南学报,1951(2).
- [6][唐]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7]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8][宋]范祖禹,撰.唐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薛宗正.突厥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1]王世丽.安北与单于都护府——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12][唐]杜佑,撰.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朱德军,王凤翔.长安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走向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14]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1).

[15]张沛.昭陵碑石[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16]彭建英.试论6—8世纪突厥与铁勒的族际互动与民族认同[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4).

[17]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8][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0]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三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22]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二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23]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J].史林,2004(5).

[24]王玉清,苟若愚.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7(2).

[25]朱振宏.阿史那婆罗门墓志笺证考释[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第28辑).

[26]艾冲.唐太宗朝突厥族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2).

[27][唐]吴兢,撰.贞观政要集校[M].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28][宋]王溥,撰.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责任编辑 张玉海)

